

希利斯·米勒与中国人文学术的国际化

王宁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上海 200240)

摘要:希利斯·米勒作为美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文学理论家之一,在中国也有着众多的研究者和批评者,他的著述经常被人们引用和批评性地讨论,对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家的理论思考和建构也不无启迪。他生前先后20多次到中国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在中国的一些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讲学,并于2015年和2016年分别在美国和中国出版了他的中国演讲集。米勒之于中国的意义特别体现于下列两个事件:其一是中国学界对他关于“文学终结”的观点及其所引发的争论产生的误解,其二是他与中国学者张江就“强制阐释”问题进行的通信交流和讨论,尤其是后者同时在中国和西方语境中引发了较大的批评性讨论。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要走向世界,正需要像米勒这样的西方主流理论家的支持和推进。因此就这一点而言,米勒为中国人文学术国际化作出的贡献尤其应该受到赞赏和重视。

关键词:希利斯·米勒;中国人文学术;文学终结论;强制阐释;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23)06-0005-11

DOI:10.14134/j.cnki.cn33-1337/c.2023.06.001

一、引言

J. 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 1928—2021)于2021年2月7日由于新冠病毒性肺炎溘然去世,留给我们太多的学术遗产和理论思考。作为美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文学理论家和比较文学学者之一,米勒的著述在中国也经常被人们引用和批评性地讨论,这不仅是因为他的不少著作和论文被翻译成了中文,还因为他与中国文学理论家以及英文和比较文学学者有着较为密切的私人交往和学术交流。自20世纪80年代末他首次随同美国人文与科学院代表团访华以来,先后20多次到中国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并在中国的一些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讲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1世纪发生在中国学界的与他密切相关的两件大事:一件是对他关于“文学终结”的观点及其所引发的争论产生的误解,另一件则是他与中国学者张江就“强制阐释”问题进行的通信交流和讨论。这两个事件都在中国的语境中引发了较大

收稿日期:2023-07-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学研究”(14ZDB082)

作者简介:王宁,男,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前任会长,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拉丁美洲科学院院士,主要从事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

的批评性讨论,特别是后者还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影响。因此,当我们在纪念米勒这位中国学界的老朋友时,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忘记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学术事件。毫无疑问,米勒的巨大努力促进了中国文学批评和人文学术国际化的发展,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赞赏和积极评价。在当前的中美关系处于低谷时,我们尤其需要像米勒这样有着巨大影响力的人文学者推进中美人文交流。有鉴于此,我在本文中,不仅要回顾米勒的著作及批评理论在中国的总体接受情况,同时也将更多地强调他的学术遗产之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国际化的意义。作为米勒的老朋友,我首先回顾一下本人和他长达20多年的个人交往和学术交流,因为这对后人从事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二、追忆米勒的中国之旅

希利斯·米勒这个名字中国学术界并不陌生,在中国的文学理论、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领域更是如雷贯耳。我们都知道,米勒曾是享有国际盛誉的现代语言协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前任主席,并很早就当选为美国人文与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此外,他之所以在中国学界有着如此高的知名度,主要基于这样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确实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人文学界的主流学者,而不是处于边缘地位的汉学家。单从他的这些闪光的经历就不难看出他在美国学界所处的领军地位。他早年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后来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在那里他参与了现象学文学批评日内瓦学派的活动。之后,他到耶鲁大学任教,从而与雅克·德里达和其他三位耶鲁批评家——保罗·德曼、杰弗里·哈特曼和哈罗德·布鲁姆——有了直接的交往,并一度形成了所谓的解构主义批评“耶鲁学派”。尽管他很久以前就离开了耶鲁,但是每次我去耶鲁大学访问讲学时,总是听人们提到米勒的名字,这说明他后来一直或多或少与耶鲁的同事们保持着交流和联系。

事实上,据我所知,这四位耶鲁批评家的学术生涯是截然不同的,他们被人们统称为“耶鲁学派”的原因主要有几个。首先,他们都写了很多文学理论著作和批评文章,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对美国的文学批评时尚的嬗变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其次,他们又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德里达的启迪和影响,因而在他们的批评实践中表现出某种鲜明的解构主义倾向,尽管后来布鲁姆对德里达的学说甚至与他分道扬镳。最后,他们都在耶鲁大学英文系和比较文学系任教,同时又直接地介入了美国的文学理论批评,扮演着学者型批评家的角色。所以称他们为“耶鲁学派”倒是一种很方便的做法,甚至一度连德里达这位耶鲁大学的客座教授也被列为耶鲁学派的编外成员。但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这四位批评家的著作,便会很容易地发现,所谓的“耶鲁学派”并不是一个具有相同原则或倾向的批评学派,而是一个松散的、各自独立但总体上又有着相对一致的解构倾向的批评群体。因为他们都在耶鲁大学任教,经常进行批评性的讨论,甚至相互之间展开辩论,所以人们将他们统称为“耶鲁学派”也就不足为奇了。

米勒之所以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界享有盛名,第二个原因在于他从一开始就作为德里达解构主义在美国的最重要代表和实践者之一被介绍到中国学术界。他的部分著作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被译成中文,对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和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当然,与其学术高产相比,米勒的著作译成中文的并不算多:《跨越边界:翻译·文学·批评》(单德兴译,1995年)、《重申解构主义》(郭英剑译,1998年)、《解读叙事》(申丹译,2002年)、《土著与数码冲浪者》(易晓明译,2004年)、《文学死了吗?》(秦立彦译,2007年)、《小说与重复》(王宏图译,2008年)、《J.希利斯·米勒文集》(王逢振、周敏译,2016年)、《萌在他乡:米勒中国演讲集》(国荣译,2016年)。但是讨论米勒及其批评思想的文章则数量众多,散见于国内的学术期刊和各种文集中^[1]。

虽然近几年来国内文学理论批评界和比较文学界对他的《小说与重复》所引发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但这部著作直至2008年才正式出版完整的中译本,在这之前关于这本书的评介文章倒是很多,我

本人也写过一些涉及这本书以及米勒的批评理论的文章^[2-6]。由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确实需要米勒这样既有理论又十分博学的学者型批评家,同时,对于中国学界来说,也确实需要米勒这样的主流人文学者来帮助我们推动中国人文学术的国际化进程,因此米勒的批评论著在中国文学批评界便受到特别的关注。自本世纪初以来,这种关注甚至有增无减,包括来自几所著名大学的博士生撰写的论文也以米勒为研究对象,对他的学术思想和批评理论加以阐述和批评性讨论,这在他的祖国美国甚至都十分少见。难怪米勒生前经常不无调侃地和他的同事们说,“我在中国的知名度比在美国的知名度还要高”。

第三个原因则在于,米勒不像那些自视甚高的西方理论家那样难以接近,他是一位非常谦和友善和平易近人的长者。无论你是著名的教授,还是初出茅庐的博士生,无论何时你给他写信,询问有关学术问题的建议,他总是第一时间亲自回复。对于一个八十多岁只能用一只手打字的老人来说,操作电脑无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相比之下,许多比他年轻的中国人文学者也许早就不再亲自使用电脑回复邮件了,他们所有的信件都由家人处理或让学生去回复,或者干脆不回复。由于米勒亲自处理各种通过邮件提出的问题,这便使他在中国学界很有人缘,并广受欢迎,其知名度也很高。他还经常应邀到中国各大学演讲,到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做主旨发言,通常只要没有其他安排,他总是有求必应,尽量满足中国学者的要求。因此,我们就有了这样一本题为《萌在他乡》的米勒中国演讲集^[7],这是他在过去20年里在中国十几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发表的30场演讲的精选文集。作为一位学者型批评家,米勒从不满足于为了演讲而写作,他总是不断地修改和扩充演讲稿,并且针对听众提出的各种问题加以回答,从而使其成为一篇可以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就这个意义而言,他的学术研究和批评性写作方式无疑为青年学者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我是在1993年秋季与米勒相识的,当时他第二次应邀在北京大学演讲,而我作为一名年轻的教授,并没有过多的机会与他进行深入交流。直到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我才真正开始较为频繁地与他交往。从那时起,我们便成了亲密的朋友,保持通信长达20多年。当时我在北京语言大学创办了比较文学研究所,后来又在清华大学创办了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米勒均被我聘请为客座教授。我们每年都要举行国际学术会议,米勒总是我们最先想到要邀请的美国学者之一。就在几年前,当我从米勒的信中得知,一家美国大学出版社将出版他的中国演讲选集时,我立刻觉得这本书应该翻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出版。我便鼓励我以前的两个学生分别做了下列工作:国荣作为我在北京语言大学指导过的硕士研究生,负责大部分翻译工作;郭艳娟曾在我指导下撰写了米勒文学批评思想的博士论文,后来出任南京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她本人也对这本书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并且得到社领导的大力支持。在两位中青年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该书最终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8]。

另一件令我至今难忘的事就是,米勒这本中国演讲集的英文版序言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写的,他是米勒以前在耶鲁的同事,也是我们共同的老朋友。以詹姆逊在美国的学术地位和他与米勒的私交,他为米勒的书作序是当之无愧的。但是当这本书即将出版中文版时,米勒却建议中文版应该请我作序,我猜想主要是因为我大力推荐它在中国出版。另一个原因则可能是因为书中的许多章节最初都是米勒的公开讲座或在我安排或组织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的主题演讲。这些论文饱含着作者的批评性智慧和犀利的思想,正是中国学术界和文学批评界今天所需要的精神食粮,尤其是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文学和文学研究面临各种通俗文化甚至高科技的严峻挑战。面对各种高科技数字媒体和技术的挑战,人文学科已经被大大地边缘化了,更不用说文学和纸质版的文学作品及其研究著述了。“文学与文学研究向何处去”已成为每一个致力于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学者所关注的问题。面对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面临的严峻挑战,一些理论家无可奈何地持悲观态度。例如,在特里·伊格尔顿看来,文学和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很久了:

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雅克·拉康、克罗德·列维-斯特劳斯、路易·阿尔都塞、罗兰·巴特和米歇尔·福柯的开拓性著述已经远离我们几十年了。甚至雷蒙德·威廉斯、露丝·伊瑞格里、皮埃尔·布尔迪厄、朱丽亚·克里斯蒂娃、雅克·德里达、爱莱娜·西苏、于尔根·哈贝马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爱德华·赛义德早期的那些具有开拓意义的著述也远离我们多年了^[9]。

毋庸置疑,作为一个毕生致力于文学教学和研究的资深人文学者,米勒并不认同上述对当前文学和文学研究状况的悲观态度。他依然十分重视文学和文学理论在当代的作用,并且在各种场合不断地为文学的生存进行“最后一搏”。但他同时也提醒我们,正确的做法是,不要因为文学的衰落而气馁或走向反面,文学研究者面对全球化和高科技浪潮的冲击要保持冷静,从容地从事自己的文学批评和研究。这对于我们每一个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来说,都应该是一种慰藉:文学不会消亡,但它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处于一个“黄金时代”。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本文集便揭示了一位毕生从事文学理论批评和研究的老学者为捍卫文学的合法性和生存价值所做的最后一搏,包含着深厚的人文情怀和社会担当。所以当米勒再三要求我为这本书的中文版撰写序言时,我便感到既诚惶诚恐又不无荣幸,但最终还是欣然接受了。

三、米勒与中国学者的交流和平等对话

从以上我对如何与米勒相识和相交的简要描述,以及他的批评理论对包括我在内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和学者的启发和影响,我可以这样说,米勒在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界的地位和他与中国学者的友谊是令人赞赏和难忘的。如果说比较文学的一个作用就在于充当国际人文交流或人文外交之中介的话,那么我们完全可以从米勒这位出生在美国本土的人文学者对中国文化的态度的转变——从本质上的隔膜到发生兴趣进而发展到愈益热爱——见出,通过这种人文外交的手段,我们可以培养一批知华友华的人文学者,同时也可以使那些资深学者对中国的态度发生变化。米勒的这一个案将为未来从事中美人文交流的学者所关注和研究,这些也都体现在他的中国演讲集中。但在这一部分,我将更多地讨论米勒中国演讲集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部分——它的两个附录,因为如果前十五篇演讲都是米勒本人的独白,那么作为附录的一部分,这本演讲集还包括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与中国学者张江的两轮对话。在我看来,这应该是过去十年内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国际化的最重要进展之一。众所周知,中西文学关系长期以来是不平等的。我们国内的文学研究者总是不惜一切代价邀请西方文学理论家和学者来中国讲学,但我们却很少把自己的理论家介绍给国际学术界,或者说即使我们想推荐他们在国际论坛上发言,他们也很少能引起西方学者的兴趣和关注,更不用说西方的出版机构和学术刊物争相去组织译介发表他们的著述和论文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米勒与张江的开创性对话应该是一个十分罕见的例子。特别令我感到自豪和欣慰的是,在我的策划和推动下,美国比较文学学会会刊《比较文学研究》(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破例刊登了张江与米勒的书信往来,这也是中国文学理论家与西方文学理论家首次在一个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和批评对话。这一事件已经并将继续对国际文学理论界和比较文学界产生深远的影响。我相信,由于米勒树立了这样一个榜样,在未来的年代里,中国的人文学者与西方乃至国际学界之间将会有更多的交流和对话。

有人可能会问,张江和米勒对话的意义和影响究竟何在?我想在这里再次略加阐发。首先,这两封信是中美两位著名文学理论家的两轮书信往来。这些通信试图告诉我们国际的尤其是西方的同行和读者:即使在文学和文化理论衰落的“后理论时代”,中国文学学者仍然对西方文学理论抱有浓厚的兴趣,并且仍在认真地研读他们的代表性著作,但这种兴趣已不再体现为以往的那种顶礼膜拜式的研读,而是一种批判性的研读,并且不时地在阅读过程中对其中的困惑和不解之处提出质疑和挑战。这

些信件还表明,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不仅通过翻译来阅读西方文学理论家的著作,而且直接认真地研读原文,如果有任何困惑或疑问,尽可能与原作者商榷和讨论。他们在认真研究西方文学理论著作的同时,也不时地提出一些相关甚至具有挑战性的问题,通过与原作者的直接讨论和对话,达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相对共识。此外,在仔细阅读了彼此的书信后,两位批评家深感中西学者和理论家在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上仍然存在较大的误解和分歧,因此迫切需要进一步沟通和对话。只有通过这样的直接对话,才能达成相对的共识,才能推动国际文学理论批评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近几十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大量的西方学术理论著作,特别是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著作被争相译介到中国,对中国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的批评思想和研究方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今天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界,雅克·德里达、雅克·拉康、诺斯洛普·弗莱、罗兰·巴特、爱莱娜·西苏、米歇尔·福柯、爱德华·赛义德、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哈罗德·布鲁姆、特里·伊格尔顿、加亚特里·斯皮瓦克、霍米·巴巴、斯蒂芬·格林布拉特、乔纳森·卡勒、朱迪思·巴特勒、戴维·戴姆拉什以及米勒本人等学者,经常高视阔步地出现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家和学者的著述中,不断地被他们引证和讨论。任何文学学者或批评家如果不知道上述西方文论家的名字,都会感到惭愧,甚至被视为不学无术。即使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学理论的人,至少也曾听说过上述几位理论大家的名字。一些中国学者不仅熟悉他们的著作和思想,而且还自觉地将其运用到中国语境下的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文学现象的阐释中。当然,这些对于我们理解西方和国际文学理论批评的已有成就和介入当前的热点问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同时也有助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论化和学术化。然而,这只是中国文论国际化进程中的第一步,我们绝不能仅仅满足于西方文论在中国的译介以及我们对它们的讨论和研究。我们更加需要的是在国际论坛或权威学术期刊上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并发表我们自己的论文和著述,亦即我们作为中国学者,研究世界文学或文学理论就应该具有中国立场和中国视角^[10],这样我们的声音才有可能被听到,我们的著述才有可能被国外学者阅读,甚至被讨论。在这方面,米勒的尝试代表了西方学者愿意倾听中国学者言说的一大进步,他的回应反映了一位西方学者对中国学者观点的兴趣和重视,因此可以说,这是两位中西文学理论大家之间平等对话的基础。

当然,作为张江-米勒对话的策划者和推进者,我始终由衷地感谢米勒不顾年迈和身体的虚弱,依然慷慨地应允与张江进行对话,尽管他们以前从未见过面,尽管他们的对话还必须通过翻译的中介才能实现。因此我在应《比较文学研究》主编邀请为他们的对话撰写的导言中这样写道:

下面是中国和西方的两位文学理论大家的往来书信,这些书信将向国际读者揭示出中国的文学研究者是如何受到西方文论的鼓舞和激励,又如何认真地研读西方文论的重要著作并提出一些相关的具有挑战性问题的,他们又是如何以一种热切的心情与西方同行就相关的文学问题进行对话的。读者们将看到像希利斯·米勒这样的资深西方文论家又是如何耐心并认真地回答中国同行的问题并作出自己的回应的。这样,一个中西方文学理论的学术对话就通过国际通用的语言——英语的中介有效地展开了^[11]。

虽然他们对话的焦点是米勒1982年出版的《小说与重复》一书,但张江出于对产生自西方的阐释学和接受美学教义的不满,向米勒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确定的文本究竟有没有一个相对确定的主旨,这个主旨能够为多数人所基本认同?”^[12]如果没有这样的主旨,为什么米勒总是在阅读一些英文小说时,试图找到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模式呢?米勒对这个问题做了这样的回答:“我原本认为,确定一个主题只是一个对于特定文本深思熟虑的教学、阅读以及相关创作的开端。”^[12]然后他以自己所熟悉的乔治·爱略特的《米德尔马契》为例对他的观点进行辩护,认为这部小说就是一部有着多个主题的作品,这种情况在其他作品中也不鲜见。当然,他也意识到中国和西方学者在阅读策略上的差异,所以在他看来,“我们倾向于认为只有具有原创性的解读才值得出版,而中国学者可能认为,通过在新

的文章与书籍中进行重复来保持那些被普遍接受的解读是很重要的”^[12]。虽然米勒并没有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寻找别人阅读的模式,但他的“重复”已经成为中国读者阅读和理解文学作品的一种“模式”,或者说他实际上已经建立了这样一种模式。这也许正是他在中国受到的创造性和建构性接受的原因所在。

张江在回复米勒的信中,也进一步表达了自己的兴趣,例如他对米勒本人的身份和在批评界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也很感兴趣。他问道,许多中国文学研究者在解构主义的阅读和批评中有这样一种困惑,亦即米勒自己是否可以被认为是一个解构主义者,以及解构主义是否只想要破坏文本,或者说解构主义是否也有积极和建设性的一面?我们都知道,解构主义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最有影响的批评理论之一,曾经一度主导过英语世界的文学批评和人文学术研究。即使解构主义思潮在西方衰落之后,它在中国以及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仍然有着一定的影响力。特别是我们今天运用解构的思维致力于打破国际事务中西方的,或更具体地说,美国的霸权主义仍是十分有效的,也能彰显非西方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建设性作用。这样看来,米勒的知名度也正在于他被认为是继德里达之后最杰出的解构主义批评家。这也就是为什么张江选择与米勒进行对话的原因所在,同时他也对德里达的理论教义和米勒的批评实践之间的不一致感到困惑。对于这一困惑,米勒干脆做了这样的回答,“如果说我是或曾经是一个‘解构主义者’……的话,我可从来拒绝理性,也不怀疑真理……我认为,我也不否定所有先前的批评……我希望以开放的心态进行我自己的文本阅读”^[12]。毫无疑问,米勒的这一回答确实一定程度上也解决了不少中国学者对解构主义之特征的困惑和误解:他曾经是一个解构主义批评家,或者更早一些,他也是一位坚定的现象学批评的实践者,但是他与他的许多欧美同行所不同的是,他从不拘泥于一个批评学派,而是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著述风格,不断地接受新的思想,最终使自己的批评理论变得成熟。他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也是如此,从早先的隔膜到开始了解,直到最后深深地热爱。

由此可见,米勒的回答已表明,他本人虽曾一度沉迷于解构主义理论,并将其创造性地运用于自己的阅读和批评实践,但他也如同德里达一样,始终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立思考同时又不断地与时俱进的理论家,而不像他的一些耶鲁同行尤其是布鲁姆那样走极端。但米勒的著述和为人也并不一致:在学术上,他敢于坚持自己的立场观点,甚至对德里达的一些观点也提出挑战和批评。例如他在中国广为人们热议的“文学终结论”实际上就是他对德里达的《明信片》的一种反讽式批评,而中国的不少批评家却由此得出错误的结论:米勒本人也在鼓吹“文学终结论”。这确实是一个极大的误解,米勒实际上在嘲讽德里达的同时,也提请文学研究者注意一个现实:文学已经不像以往那样对人们有吸引力了,因为当代高科技创造出了太多的替代品,今天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实在太多,以至于不会再像以往那样钟情于文学。因此作为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应该做好准备。可以说,米勒当年的预言已为今天的现实所证实。同时这也说明了一点:解构主义所追求的差异常常使自己也被人误读,但是这种误读有时也会引发一些积极的东西。至少说米勒对“文学终结论”的批评引发了中国学者对这一话题的兴趣和批评性论争,另外也扩大了年迈的米勒逐渐衰退的学术影响力^[13]。当米勒听人说起他的这一观点引发了中国批评界的讨论时,他心中却暗自欣喜。实际上,米勒本人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都保持对文学的极大热情,并致力于文学理论批评和研究。但他和布鲁姆不同的是,他一直和德里达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直到后者去世后,他依然著述撰文,不仅怀念这位老友,同时也讨论他的思想。可以说,在解构这一点上,他并不完全同意德里达的观点。也许我们可以比较这两位理论家各自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如果德里达主要算是一位专攻元理论的哲学家,那么米勒则主要是一位文学批评家和学者,他创造性地应用了德里达的理论学说,同时也将他早年从现象学家普莱那里获得的教益糅合其中,以具体的文学阅读和批评实践为主,使自己的批评带有解构理论的色彩。也就是说,他在批评实践中不断

地吸收新的理论观点,从不盲从他的朋友和同事普莱和德里达的理论教义,从而在长期的批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这也正是他得以确立自己在美国人文学界的地位的重要基础。换句话说,米勒在从事解构式阅读和批评的过程中也建构了一套自己的理论话语。这也与张江的批评方法相似:他们都不空谈理论,而是从阅读具体的文学作品开始讨论一些理论问题。因此,米勒的批评实践或多或少与解构主义的原则并非一致,而倒是更应当被视为解构主义在英语世界的一种变体。对于这一点,张江早已有所感觉并在与他的对话中得到进一步确认。米勒可以说是一个思想开放和不断与时俱进的建设性解构批评家。这应该是两位批评大家能够走到一起进行切磋对话的一个基点。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张江在这本书中发现很难把握米勒的批评立场,或者更确切地说,米勒在阅读过程中注意力的转移,以及立场的变化是否想表明,解构主义也存在理论与实践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米勒的回答是,事实上,德里达在马丁·海德格尔的术语 *destruktion* 的基础上发明了解构这一术语,但是经过德里达的改造之后,这个术语既有了积极的建构含义,也仍保有消极的含义:既有破坏性又有建设性。而且德里达本人后来的思想和著述风格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苏东发生剧变后,许多曾经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而德里达却基于自己的深入思考写下了《马克思的幽灵》这部著作,号召人们去仔细地阅读马克思的原著,表现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定程度上的信奉和重视^[4,14-16]。因此,米勒的答案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家和研究者的一个难题。确实,我们过去误解了解构主义批评,认为解构主义的特征体现在没有任何建设性贡献的情况下总是消解和破坏一切,因而被认为是一种“虚无主义的”思维模式。而实际上,就解构主义本身的意义而言,它则是不仅破坏了既定的结构主义学说,同时又建构了一些新的东西,这正是大多数中国学者和批评家所忽略的。

在他们的第二轮通信中,他们还谈到了其他一些理论问题,比如当代文学批评著作能否成为经典,如果可以的话,一部文学批评作品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为经典。张江试图证明米勒的《小说和重复》显然比他写的其他著作更有影响力,至少在中国是如此。因此,在他看来,“任何可以称为经典的著作,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被忘记”^[12]。米勒的这本书也是如此,所以它对中国文学批评所产生的影响比他后期的任何著作都要大。这可能就是米勒的著作之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性,同时也是张江为什么要花费大量时间反复阅读这本书的原因所在。在张江看来,米勒对解构主义的背离,是否与巴尔扎克对自己贵族倾向的背离相似。但米勒却不这样认为,而是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回应:文学理论总是试图将自己表现为普遍适用的,解构主义也不例外。但对他来说,“每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在很大程度上,一部文学作品超越理论的原因,就在于诗歌或小说不像一个待解的数学方程式,或一个待判断对错的哲学论证”^[12]。也就是说,如果每部作品都超越了理论的预设,那么对一首诗或一部小说的解释就与对一个数学方程式的解答或对一个哲学论点的证明有着截然不同的结果。由此可见,他们的对话从阅读文学作品和批评性地讨论作品开始,经过一些理论阐述之后,又回到对文学作品和批评作品的理解和阐释上来。这显然是对当前流行的所谓“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批评”的一种反拨。在这一点上,米勒和张江达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也即从事文学批评和阐释,必须从仔细阅读文学文本开始。实际上,德里达对文本的阅读也是十分细致的,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对马克思的著作的细读上^[4]。

四、张江-米勒对话之于当代人文学术的意义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张江和米勒对话的意义究竟何在?我认为这次对话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这是中美两位著名文学理论家第一次通过通信进行的对话。这些书信告诉我们的西方乃至国际同行和一般读者,即使在“后理论时代”文学和文化理论衰落后,文学

和文化理论在中国并没有“死亡”,虽然它被认为在其他地方已经“死亡”。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和学者对西方文学理论仍然抱有浓厚的兴趣,并且正在认真研究他们的代表性作品,但这种兴趣和研究是对西方文学理论的能动性理解,而不只是盲从这些理论家的教义,或者通过中国的文学批评实践来证明其正确性和有效性。其次,这些信件也表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家不能仅通过翻译来阅读西方文学批评家的作品,他们的阅读方式是与原文相对照的,同时也与文学文本保持密切的关系。此外,两位学者在仔细阅读了彼此的通信后,深切地感受到中西学者和理论家在某些相关理论问题上仍存在一些误解和分歧,因此,中西学术界亟需进一步的深入沟通和对话。只有通过这种对话,才能达成相对的共识,促进国际文学理论批评的健康发展。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尤其赞赏米勒的贡献。甚至在去世之前他还表示,由于他年纪太大,不便越洋飞行到中国,但仍希望他和张江能在不久的将来在美国见面,以便继续讨论。

张江-米勒对话也是因为张江不满西方理论家对文学现象所采取的所谓“强制阐释”而提出自己的反拨。张江希望他的“强制解释”理论建构能够在国际上得到批评性的回应和讨论。为此,张江在国内组织了多次有关这一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因此,关于“强制阐释”问题的讨论不仅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而且也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响应。时任国际文学研究权威刊物《现代语言季刊》(*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主编的马歇尔·布朗(Marshall Brown),在了解到关于“强制阐释”问题的讨论后,立即邀请我和他一起为该刊编辑一期主题专辑。这期专辑的标题是“中国与西方理论的碰撞”(Chinese Encounters with Western Theories),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杜克大学出版社网站显示的数据表明,这期专辑的几篇文章一经发表便立刻成为阅读量较大的文章,这无疑引起了欧洲和北美同行的关注。在我们两位特邀编辑的精心策划下,《现在语言季刊》邀请了当今中国文学理论界最具影响力的三位理论家就这一话题发表文章,随后又邀请了包括米勒在内的欧美学术界三位院士级的文学理论家对这三篇文章进行回应和评论,从而形成了中西文学理论的对话。

中国学者的三篇文章各自显示了自己的特色,分别反映了作者近期的思考和研究。我本人的文章《法国理论在中国以及中国的理论重建》根据我2015年在巴黎索邦大学的演讲稿加以修改扩充。本文首先回顾了萨特、德里达和巴迪欧这三位法国理论家在中国的译介、传播、接受和所产生的变异。我认为,在成为世界级的理论家之前,这三位法国理论家率先在英语世界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他们的进入中国,特别是德里达和巴迪欧,主要是通过英语的中介,因而他们的进入中国便激发了一大批中国学者的理论创新^[17]。受到这些法国理论家以及其他理论家包括米勒的启迪,我也在文中提出了我本人对世界诗学的理论建构。对此,米勒也给予了批评性回应:“王宁的《法国理论在中国以及中国的理论重建》一文,也像他的许多其他著述一样,是视野宏阔和全景式的,而并非高度集中的。王在文章开头几段的总结是正确的,而且很有帮助。”^[18]但他在充分肯定了我的这篇文章的价值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和困惑:

然而,我并不知道萨特在中国有这么大的影响。王宁列举了一些受到索伦·克尔凯郭尔、弗里德里希·尼采和萨特的“存在主义”影响的中国作家。在我多次访问中国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人提及他/她的作品所受到的萨特的影响。因为我的研究领域一直是文学研究和批评,在过去我最感兴趣的是萨特关于文学的论文,尽管我也阅读了萨特的纯哲学著作。那么萨特的各种著作的哪些方面对中国有着影响呢?王并没有给出具体的信息,也没有说明德里达和巴迪欧在中国是如何被阅读的。而那才是我有兴趣知道的^[18]。

米勒的这一批评意见无疑激发我在未来的著述和论文中将聚焦具体的个案来说明西方理论在中国的创造性和批评性接受。张江的《论强制阐释与中国的文学理论建构》一文,经过了多次修订和精练,并加入了对中国文学理论话语的建构^[19]。他第一次在一份主流国际学术期刊上全面表达了自己

对“强制阐释”现象的解释和批判^[19]。在这篇文章中,张江不仅对用现成的西方理论来强制性地阐释任何文学现象予以了有力的批判,而且也提出了自己对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理论建构。张江认为,“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西方理论给予我们的东西,我们应该从中汲取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以及中国的文学理论应该如何保持其相对于西方文论的自主性”^[19]。米勒对此却不以为然,倒是在几处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认为张江的文章“或多或少是对‘20世纪初以来’的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全然拒斥”:

张的文章的最后部分阐述了他关于建构一种特定的中国文学理论的观点,这样的理论应建立在中国五千年文学理论和文学实践传统的基础上。对于在思想和行动的各个领域调和这种传统与中国官方所致力于的马克思主义事业之间的困难,张却只字未提。他没有提到中国传统文论的任何一部著作,也没有提及中国文学的任何一部作品。如果举个例子倒会很有帮助,即使是在一篇相对较短的文章里也是如此^[18]。

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不难发现,两人虽然经过了一番对话在某些问题上达成了相对的共识,但在文学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和具体的著述方式上仍然存在较大的分歧。当然,米勒作为一位西方批评家,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质疑,这也是十分正常的,这至少说明他是认真地阅读了张江的文章,并基于自己的立场给予回应的。

朱立元在《希利斯·米勒论文学的终结》一文中,描述了中国文学理论界在本世纪初围绕米勒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文学的终结”观点所引发的广泛争论。他以客观冷静的态度回溯了这段历史,并没有简单地判断孰是孰非,而是针对米勒的“文学终结”思想在中国的能动接受和误读进行了批评性分析。这种方法与米勒本人的著述特点非常吻合,因此受到米勒的高度赞赏。朱立元在文章的结尾认为,一种理论概念在外国语境中被误读有时并非坏事,它有可能导致在另一语境中对这个话题的持续讨论,并且出现一些新的观点,因此在朱立元看来,“米勒关于‘文学的终结’的声明所引发的争论是中国文学理论运用西方的镜子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审视的行为。这场争论是中国文学理论中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事件,它将中国文学理论推向了一个更加开放和多元的方向,在多种不同声音的滋养下重新焕发了生机”^[13]。这显然是对国内围绕米勒的文章而争论不休的一种理论上的超越。实际上,米勒只是借德里达在《明信片》中关于文学艺术之命运的悲观论调作了一些阐发,意在提醒文学研究者谨防文学终结现象的出现。但是译者国荣在翻译成中文时坚持字面上忠实原文,并未加一个说明性的注释,以表明这并不是米勒本人的观点,因而造成的结果是读者误以为米勒也是持这样的观点。但是这一看法所引发的争论倒是米勒所期待的。直到这场争论在中国学界告一个段落,米勒才在其他场合阐明自己的文学观^[20]。

作为这组文章的认真仔细的读者和评论者,米勒对这三篇文章进行了批评性的评点,认为“它们的共同主题出现在近年来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学术和教学中。我从每篇论文中学到了很多。他们的关注点和方式有着惊人的多样性”^[18]。当然,他也表达了对这三位中国理论家的不同意见,尤其是对我们试图建构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国批评话语表示不解。在他看来,中国学者,“想要通过发展一种独特的中国文学理论来做到这一点,这种文学理论将排斥他们所谓的西方价值观,当然这种目的是可以理解的”^[18]。但实际上,他又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在米勒的思想深处,仍对中国是否有自己独特的文学理论抱有怀疑,这自然是无可厚非的,也从反面说明了中国文学理论在海外的微不足道的接受和影响。因此,无论我们对他的存疑作何理解,至少他本人仍然对文学和文学研究的未来是抱有信心的,因为它们通过东西方作家和理论批评家的共同努力,正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他也借此表达了自己对文学和文学理论的未来看法:

最后,我对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本质和功用的看法自我写作《文学的终结》一文以来一直在发展和变化。我喜爱文学。我的职业一直是阅读、教学、演讲,以及用传统的印刷小说、诗歌

和戏剧的方式写作评论文学的文字。我会继续这么做下去。然而,我最近不再那么确信我所提出的关于在新的电信体制下文学研究仍有着巨大价值的看法。现在很多人已不再怎么阅读印刷的文学作品,他们会去玩电子游戏……^[18]

这就是米勒对所谓“文学终结”的态度和对文学在未来的前途和命运的担忧。实际上,米勒和张江对话的意义还不局限于文学理论和批评,它促使我们思考人文学者在当今时代的作用,尤其是近几年来中国和西方诸国特别是和美国的关系处于一种紧张甚至敌对的状态时,人文外交的重要性就愈发显示出来。我们都知道,世界上绝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永远的敌人,如何化敌为友,如何“化敌为友”,变敌对性竞争为友好竞争实际上也是一种技巧。而要实现这一目的,除了政府领导人和外交机构付出主要努力外,人文学者也应该有所作为。人文学者的作用就是通过人文交流来实现一种“人文外交”。善于利用纷纭复杂的国际关系发展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已经成为我们人文学者无法回避的一个使命。确实,中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被公认为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这一点主要体现于最近2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而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它也开始逐步体现于中国的文化和文学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在这方面,新一代人文学者应该大有作为。在当下的国内外知识界为人们谈论得最多的话题之一就是中美关系的恶化和未来的前景。一些患“恐美症”的人似乎忧心忡忡,担心得罪了美国人将来就没有好日子过了,弄得不好还会爆发战争。另一些坚定的反美者则主张干脆就与美国断绝一切来往,走自己的路,如果不得不开战也无所畏惧。

当然,作为一位人文学者,我认为上述两种看法都难免有失偏颇。至少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每个国家都处于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你中有我,我中也有你。互联网的普及更是将我们与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联通”为一体了,可以说,我们今天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地球村”里,这虽然如安德森所言曾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但现在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命运共同体”了。生活在这样一个共同体中,各国人民不仅分享福祉,同时也承担责任。中美两国有着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但这不应该影响两国的人文学术交流。也许两国人文学者的民间交流对政府间的对话能起到建设性的作用,在这方面,人文学者将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就这一点而言,米勒的去世不仅是美国学界的一大损失,对中国的人文学界也是一大损失。也许在这一点上,我们不难发现米勒与张江对话的更为广泛的人文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 [1]张旭.多维视野下的希利斯·米勒文论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1-199.
- [2]王宁.后结构主义与解构批评[J].文学评论,1987(6):143-151.
- [3]王宁.希利斯·米勒和他的解构批评[J].南方文坛,2001(1):11-12.
- [4]王宁.马克思主义与解构理论[J].学术月刊,2007(9):5-12.
- [5]王宁.耶鲁批评家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启示[J].中国图书评论,2008(11):92-95.
- [6]王宁.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解构主义的推进[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127-139.
- [7]MILLER J H. An Innocent Abroad: Lectures in China[M].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15: 1-339.
- [8]米勒.萌在他乡:米勒中国演讲集[M].国荣,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 [9]EAGLETON T. After Theory[M].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4: 1.
- [10]王宁.世界文学研究应有中国立场和中国视角[N].光明日报,2023-08-30(13).
- [11]WANG N. Introduction: Toward a Substantial Chinese-Western Theoretical Dialogue[J].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2016, 53(3): 562-567.
- [12]ZHANG J, MILLER J H. Exchange of Letters About Literary Theory Between Zhang Jiang and J. Hillis Miller[J].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2016, 53(3): 567-610.

- [13] ZHU L Y. Hillis Miller on the End of Literature[J].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2018, 79(3): 289-307.
- [14] 王宁. 德里达与解构批评: 重新思考[M]//王宁. 文学理论前沿: 第二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81-202.
- [15] 王宁. 德里达的幽灵: 走向全球人文的建构[J]. *探索与争鸣*, 2018(6): 13-20.
- [16] WANG N. Specters of Derrida: Toward a Cosmopolitan Humanities[J]. *Derrida Today*, 2018, 11(1): 72-80.
- [17] WANG N. French Theories in China and the Chinese Theoretical (Re) construction[J].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2018, 79(3): 249-267.
- [18] MILLER J H.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in China[J].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2018, 79(3): 341-353.
- [19] ZHANG J. On Imposed Interpretation and Chinese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Theory[J].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2018, 79(3): 269-288.
- [20] MILLER J H.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Literature[J]. *Neohelicon*, 2011, 38(2): 251-265.

J. Hillis Miller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a's Humanities

WANG N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Abstract: J. Hillis Miller,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contemporary American literary theorists, has been critically and scholarly studied by many Chinese scholars and critics. His works are often quoted and discussed critically, and are also enlightening to the theoretical thinking and construction of China's literary critics. He has been to China more than 20 times, attending various conferences, lecturing in some famous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China. In 2015 and 2016,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 selected volume of his China lectures were published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Miller's significance to China is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the misunderstanding among Chinese scholars of his views on the "end of literature" and the debate that ensued, and also in his exchange letters of discussion with Chinese scholar Zhang Jiang on the issue of "imposed interpretation", which triggered large-scale critical discussion in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contexts.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and literary studies need the support and promotion of mainstream Western theorists like Miller if they are to go global. As such, Miller's contribu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a's humanities and academia should be especially appreciated and valued.

Key words: J. Hillis Miller; China's humanities; the idea on the end of literature; imposed interpret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责任编辑 张伟 李裕政)